

# 龙岩地方史研究

郭启熹 著



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

# 龙岩地方史研究

郭启熹 著

香港公元出版社



**[作者简介]**郭启熹，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江山乡人，教授，1937年1月生，1953年2月开始任教至今。原闽西大学校长，福建省语言学会副会长、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理事。现任闽西大学学报主编，龙岩诗词学会会长，龙岩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龙岩市客联会理事。先后参加主编《福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等三本书，出版《古音与教学》《龙岩地区方志·方言志》等八种著作，撰写论文四十余篇，其中《文学音韵学的几点思考》等两篇获省语言学论文一等奖，目前在撰写《福建省客家志·方言志》等。

谨向本书捐助人致崇高谢意



本书捐助人  
龙岩市华宏建筑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林长清先生玉照

## 《龙岩地方史研究》序

张 惟

闽西大学原校长郭启熹教授专著《龙岩地方史研究》，是由多篇具有独立性的论文组成而又有机统一的合集，对龙岩多元文化区域的研究，是一种开创性的贡献。

这里所称的龙岩，是专指现今福建省龙岩市政域。这一地域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一万年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至少应该研究到有史记载的两千年前的百越故地，以及华夏汉人南下开发融合的历史。进入盛唐时期，这一地域分属汀州府与漳州府，同为中原文化南下与越地的融合却出现了差异。今天龙岩市所管辖的区域，实际上是古汀州八县中的5个县，即长汀、上杭、永定、连城、武平，属于纯客家县，而新罗区和漳平市，属于从漳州府独立出来的龙岩直隶州衍化的，是河洛（闽南）文化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把历史上的一府一州合并成为一个地区（今为设区市），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在这里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核心区域的组成部分。它所建立的先进思想文化，是足以吸收、融合、改造、创新当地的一切历史文化的。这就是龙岩多元文化区域很大的一个历史特点。

郭启熹教授进行龙岩地方史的研究，正是充分地认识和把握龙岩多元文化区域的特点。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高度，在开篇《闽西文化族群的发展》中，首先就提出中国文化的“有容乃

大”，并引用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多元一体是中国式的思想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正是尊重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历史发展规律，作者从古闽族群、百越族群、汉族群入主闽西直到河老（洛）与客家族群共处，详尽阐明了闽西文明的发展史，避免了过去某些著作研究闽西文化源流时各执一端的片面性，是有利于团结、整合和创新闽西文化的。

在各篇的分述中，《闽西畬族源流初探》、《河老人开创了龙岩文明史》和《客家民系在闽西的形成与发展》显然占有重要的位置。

闽西既为百越故地，作者以充分的考据论证在中原汉人南下之前，畬族的先祖曾是闽西当地的土著主族。后来所称客家或“反客为主”，实际上是畬族对中原客人的称谓和反映。畬族与南下汉人的大规模融合，有少数生活在僻远深山的畬人（如漳平山羊隔）和流徙到台湾的高山族，应是保存闽越人血统和风俗的直接的后裔。挖掘闽西文化中的畬族文化的因素和影响，是《龙岩地方史研究》作者所深切关注的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关于河老人开创龙岩的历史，郭启熹教授的论述是我迄今看到的较完整的一篇。据考称南下福建的汉人为河老，源于唐朝·明末顾炎武的解释是“谓自河南迁来……系陈元光将卒始也。”后客家人称龙岩人（含闽人）为福佬或是一音之转。台湾人多由闽南迁往，他们多以河洛人、河洛文化自称。河自指黄河，洛为洛水，也指洛京，因为中原汉人第一次大举入闽是西晋“八王之乱”，士大夫聚集晋江怀念故国和首都洛阳，自称河洛比河老显得雅气些也更有文化品味，这一称谓就带到了台湾。晋、唐以来，自晋江继续南下九龙江的河洛人，有一部人溯九龙江而上开拓苦草镇（今龙岩市新罗区）和九龙乡（今漳平市），后来发展成为龙岩、漳平、宁洋三县，直至从漳州府分出成为龙岩直隶州，并列诸郡，并成为贯

通泉州、漳州、潮州这一广大闽南语言文化区域的交通要地，共同创造了河洛文明，并成为河洛文明与客家文化碰撞、交融的前阵地。这一独特的历史，常常被疏忽或淹没了，郭启熹教授这章的论述，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闽西历来被认为是客家的祖地，关于客家民系及文化的研究比较充分，作者在《客家民系在闽西的形成与发展》中，充分运用大量资料和近年客家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客家人在艰苦的闽西山区发展农耕文明的伟大贡献作了阐明。但作为本书的体系，似乎应该接触到同为中原南下的汉族群，何以越鄱阳湖入汀江流域盘桓于闽粤赣边山区的形成客家民系，而沿九龙江而上占据龙岩、漳平河谷平原的河洛人，却依然保存河洛文化传统，泾渭分明。这在中国汉族南迁史上，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探讨课题。

此外，本书对于清初闽西移民入川也有生动的考证论述。对于闽西野象的消失以及现今创设中国虎园对华南虎的抢救，站在当代环境保护以及建设龙岩生态城市的高度予以雄辩地展示，可谓精彩之笔。特别是作者是一位方言专家，他于本书中用了七篇，叙述闽西方言与民族迁徙的关系、龙岩话与上古汉语词汇特征、龙岩地区方言的分布形成与特点，龙岩话的音韵特征、闽西方言与普通话、漳平闽南话区中的山羊隔畲话、闽客方言隙缝中的孔夫话等，不仅具有方言研究上的价值，而且对于龙岩地方史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本书难能可贵的特色。

对于龙岩多元文化区域，从综合的角度予以整体性地分析研究，《龙岩地方史研究》是难得的、开拓性的，相信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并吸引更多的朋友研究和讨论。

## 序 文

陈宏

龙岩物华天宝钟凝神秀，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许多民间风俗、信仰、传说、地名都在记录着龙岩文明历史的进程。龙岩文化包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它既占有构成闽学重要组成的部分即所谓河老（福佬）文化，更有众所周知的客家文化。可是过去很少有人从龙岩本土文化实际出发，深入调查予以发掘整理，分析它的形成条件、经过，记录说明它是怎样支撑着我们祖先在这里辛苦地开辟创造，使我们从茫茫蛮荒中走向文明世界。闽西大学郭启熹教授有志于此，花费几年的精力撰写这本书，为弘扬龙岩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令人钦佩，为此我捐助支持他为龙岩人出版这本好书。

任何社会事业既要靠政府的重视与投入，也要靠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比如近年开发的天马山景点便是个成功的事例。这里面政府是主要的，也靠了企业界（如联通公司捐建一条上山通道）、宗教界、善男信女、各方百姓共同努力。我们华宏建筑公司也投入四万元复建陈贞庵。现在每天早晚数千人络绎不绝地上下登游，不仅多个登山锻炼的去处，更主要在登游观赏中净化了人们精神世界，饱览龙岩今天文明建设成就，从中也懂得龙岩人是怎样战胜简陋与落后。现在龙岩市城区就有许多历史人物和民间信仰，如谢安（适中孟兰会）、陈元光（西宫）、邹馨（大封山）、朱熹（龙岩洞）、郭铉郭炼（郭公庵）、张廷球（东桥坂天后宫东边）……。这些古迹都很值得我们去纪念、去恢复。近年面积不大的新罗区就



出了谢联辉、林鹏、郭柏灵等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不能不说是龙岩文化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孕育着我们一代代英杰的成长。过去我与郭启熹教授也没有什么交往，出于对建设龙岩文化事业的共同愿望，我愿意尽点菲薄之力，并与社会各界共勉。

《龙岩地方史研究》序 张 惟

序 文 叶青萍

- 1 闽西文化族群的发展 ..... (1)
- 2 闽西上古史略探 ..... (19)
- 3 闽西畬族源流初探 ..... (30)
- 4 河老人开创了龙岩文明史 ..... (43)
- 5 宁化石壁形成客家民系的内外环境 ..... (54)
- 6 客家民系在闽西的形成与发展 ..... (63)
- 7 雷姓西晋初年对闽西北的统治 ..... (74)
- 8 清初福建移民入川及川、闽间的互动发展 ..... (76)
- 9 江山——天官山风景名胜区分人文资源调查 ..... (90)
- 10 闽西南野象与华南虎考辨 ..... (98)
- 11 闽西方言与民族迁徙的关系 ..... (103)
- 12 龙岩话与上古汉语词汇特征 ..... (111)
- 13 龙岩地区方言的分布、形成与特点 ..... (124)
- 14 龙岩话的音韵特征 ..... (134)
- 15 闽西方言与普通话 ..... (141)
- 16 漳平闽南话区中的山羊隔畬语 ..... (153)
- 17 闽客方言隙缝中的孔夫话 ..... (161)

后记

## 闽西文化族群的发展

“文化”应该涵括着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制度层面、意识层面诸多方面内容,其中最具核心意义的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意识形态中最具重要的是文化认同感。

近代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中“族群理论”者,“他们主张族群(ethnicgroup)的认定不应用客观的文化特质为标准,而应以主观的文化认同为依据,换言之,族群理论的提倡者认为客观的文化特质,如语言、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甚至身体特征是易于变换的,不足以作为族群认定的标准,只有自我认同的意识才是族群存在的真正准则。”<sup>①</sup>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就在于它的“有容乃大”,它容纳着各种族群的冲突激荡,相互摄取,相互推动,甚至融为一体。今天上杭庐丰、官庄畲族乡不再保留盘瓠的图腾崇拜,与汉族区域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汉族本身就是一个各民族的融合体。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多元一体是中国式的思想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sup>②</sup>所以笔者认为观察闽西文化不容忽视这种“美”的互相尊重与不断融合。文化发展总是在不断地扬弃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真善美是文化发展的共同实现目标,也是“多元”而容于一体的发展基础,我们应当尊重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历史发展规律。如果我们研究闽西文化源流时各执一端,停留在“自美其美”是不够的,必须善于“美人之美”,这才符合文化历史发

展的现实。

据此，我们纵览自古至今闽西族群文化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五个历史发展阶段。

### 一、古闽族群

距今一万年前的“漳州人”、“清流人”属旧石器时代<sup>③</sup>，当时我们先祖足迹已经印留在闽西大地，龙岩也发现有与之同类的旧石器文化遗址<sup>④</sup>，这批先祖揭开了闽西历史的序幕。

进入新石器时代长汀河田乌石寨、武平小径背及邻近山头、龙岩登高山、天马山以及其它一些地方相继出土各种生产、生活器用的石具、陶器，定名为武夷山区地域文化遗址，不仅有用青石、页岩、燧石磨制而成的石铤、石刀、石斧、石凿、石镞等，还有大量的烧制陶器，其中长汀河田乌石寨出土的夹砂粗陶鼎足，经国家地质局研究所计风桔用热释光测定年龄法，测定为  $T4215 \pm 367$  年，这就证实了四千多年前闽西先祖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sup>⑤</sup>

商周期间是新石器与青铜器并用的时代，闽西先民和中原祖先一样，出现了原始的手工业，长汀河田乌石寨出土的素陶杯说明了当时已经有了制酒业。在石器磨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为琢磨玉器的工艺，长汀河田乌石寨遗址出土的琢磨细微的玉壁，龙岩登高山遗址发现制作精巧的耳环以及“福建东张和武平发现的残铜片，都有仿几何形印纹陶的花纹，表明这种文化的青铜器有其浓厚的地方色彩”<sup>⑥</sup>。所有这些都代表了这个时期璀灿的闽西文化的特征。

“闽”的名称比“越”的名称更早出现于史书，《周礼·职方氏》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称，却未曾见有“越”的族群出现。“闽”在当时中原统治者看来是与“大虫”、“长虫”等动物为伍的未开化族群，所以把它们作为奴役的对象。《周礼·秋官司寇》记“闽隶百有二十人”、“闽隶掌役畜养鸟而阜藩教扰之，掌

子则取隶焉”。可见商周时代古闽族群还是受中原统治者奴役的，属于要进贡宫庭做奴隶管鸟、畜的弱族群。

## 二 百越族群

春秋期间闽西属楚地，越族在先秦尚未涉足闽西。据《国语·越语》载，越族群勾践的领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灭吴之后迅速崛起，称霸江浙，传七世孙至无彊（公元前334年）国亡于楚，一大批越民族避乱入闽，开始传播越文化。”“百越”是盛言其部族的繁多，也言其分布地域之广袤。秦末群雄并起，越族首领无诸、摇等率越兵反秦有功，于是高祖5年（公元前202年）封无诸为闽粤（越）王，都冶（今福州），王闽中地；惠帝3年（公元前192年）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永嘉）；高祖12年（公元前195年）3月诏封南武侯织为南海王，“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sup>⑦</sup>。据考证南海王织的领地是以闽西武平县地为中心的汀、潮、赣之间<sup>⑧</sup>。汉文帝时，南海国亡，迁于上淦（江西），汉皇朝仍不能逾闽越占领南海国，南海国被闽越占领了，这时闽越王还乘势占领了潮、梅一带，东瓯北迁后，又席卷浙东温、台一带，足见当时闽越已成强大国势，越人在闽西是赫赫客族，并建立强有力的统治机构，越族文化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后来汉武帝时“以闽险阻，数反复；乃诏诸将，悉徙其众于江淮间，东越遂虚”<sup>⑨</sup>。实际上江、淮间仅限于贵族、官僚和军队，一般闽越平民大量沿着五岭西进入两广地区，少部分仍散居于武夷、岭南山间，“遂虚”只能说明汉皇朝统治势力在闽西已经退出。故《龙岩州志》云：“武帝灭之徙其民而虚其地，其民不从徙者复生聚”<sup>⑩</sup>。在整个西汉时期江浙一带的越族已经逐渐汉化，王充《论衡·恢国篇》称：“夏禹偁人吴国太伯采药，断发文身。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鬻衣关头，令皆夏服，褒衣履舄。”越汉逐渐融为一体。而闽西的“百越”却仍保留某些越族踪迹与民

俗,至今仍可供我们寻考。

第一,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是越族文化特征,它不同于商周人、楚人所习用的是以绳纹陶器的和泥质灰陶器为主要特点,而长汀、武平等县出土的陶器存有大量的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

第二,段石铤(即磨制为刀口的石器)被认为是越族代表性工具,闽西山地也出土不少段石铤、肩石器,小者数两,大者几十斤。邱荣洲在长汀河田乌石岙发现的两件长舌犁<sup>⑪</sup>,属于石铤类的,说明古越族的原始农业已摆脱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从锄耕进入犁耕的农业发展最初时期。

第三,畬族的祖先是否“山越”学术界历来有争论,而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成立。蒋炳钊《畬族史稿》明确指出“畬族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古代越人的后裔”,至今漳平山羊隔畬民也自称他们为“山越”。

第四,保留越人“干栏”式建筑,尤以后世山民“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居”<sup>⑫</sup>。至今闽西山区深山居民与漳平山羊隔畬民也依然保留着越人的这种建筑。

第五,洗骨葬,又称拾骨葬,起源于百越居住的南方,即人死后先土葬,数年后开棺取骨,装入陶瓷再葬,闽西山区前几年还普遍保留着越人的葬俗<sup>⑬</sup>。

第六,“断发文身”是越人特有风俗,文身之俗在闽浙一带长期保留,至今仍时有所见。

第七,古越族的象图文字。华安汰内乡仙坛有摩崖石刻六处,经福建文物管委会研究认为是原始象图文字,朱维干等人认为这可能是闽越所留<sup>⑭</sup>。这种摩崖石刻文字,福建所见一二十处,其中永定大埠坑也发现“有文纵横如篆书”<sup>⑮</sup>。

第八，古越语的沉积层：武夷山和五岭山脉都是汉武帝以后百越人迁徙匿居的山区，因此从福建赣南、粤北到广西都有不少古越族沉积下来的底层词，如“讲冇”（吹牛）用于闽南、闽西直至壮语武鸣话；邵武的“拿口、拿上、拿坑”与壮语武鸣话、傣语西傣话一样都指“田”；“伯母”叫“巴”达在龙岩与武鸣话都是一致的；还有的“阉鸡”叫“割鸡”，身表靠壁搔痒叫“揆痒”等等，有人还专门把西汉刘向《说苑》里的“越人歌”与今天壮语作了对比研究，彼此是相当接近的<sup>⑩</sup>。

综上所述，汉代以降，在闽西文化占主导地位是为越文化，由于封建皇朝采取“移民虚其地”的措施，统治势力相对薄弱，越文化得以在闽西保留发展。

### 三、多元族群融合

秦汉以来北方民族间有入闽与越族杂居者，班固《汉书·两粤列传》载：“秦并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粤杂处。”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开辟西南。孙吴在六十多年中曾五次用兵于闽、浙、赣，开辟东南，以求占有资源，扩充兵员。据《三国志·吴书·贺齐传》称，汉末建安元年（公元196）首次出兵万人占据闽江下游；建安八年贺齐再次进兵建安，斩首六千级，名帅尽擒，直到建安十年，转讨上饶，分以为建平县（今建阳），从而控制闽东、闽北。《吴书·吕岱传》《吴书·孙亮传》还载有建安十三年（208）、嘉禾四年（235）、太平二年（257）三次用兵于闽浙赣，不仅开拓吴国疆土还把这些作乱“贼众”“以充兵役”。据《太平御览》卷780引《临海水土志》载还曾渡海至台湾“得夷州数千人还”。《孙权传》还记有浮海至亶州（今吕宋岛）。所以从孙吴对闽地开发为始，至西晋太康三年（282）则可建置晋安郡，并分设新罗县。《读史方輿纪要》卷98《福建》四《汀州府》条“新罗城在府东南，

晋置新罗县”。府东南在什么地方呢？民国《长汀县志》卷6《古迹志》考定在上杭县北十五里（今旧县），并且此时还增置苦草镇（今龙岩县）。可见三国至西晋时期汉人进入闽西当以千户计，方能设县、镇建置。晋永嘉二年（308）更有“中州板荡，衣冠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sup>①7</sup>他们流寓主要地点在福、泉一带，至今福州的晋安河、泉州存有晋江、九日山麓有大量六朝墓葬便是明证。在闽西留传至今的古迹也间有所闻，如《龙岩县志》中载有“在雁石益新，相传为西晋古寺。旧有未有龙岩，先有留经（佛寺）之谚，有牲炉一，亦传为晋时所遗，字迹模糊莫辨”<sup>①8</sup>。清康熙《武平县志》载：三国时，江苏丹阳人葛玄曾来武平灵洞山修炼。今尚存灵洞天竺院、葛仙翁炼丹井遗址。<sup>①9</sup>

越人本来是“善习水性，断发文身，喜食腥臊凿齿。”是属于滨海文化族群，经汉武帝镇压之后，他们没入山林之中，不得不以狩猎为生，过着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后故称为“山越”。林惠祥曾在1936年的《中国民族史》中考证：“山越在三国时指……福建六十余郡县，贼之帅者十二人，以名称者二十三人。……然其伏匿山谷者必甚多，以其山居故又称为山越或山民。山越当时散居各处山地，故其人口不易计数。”<sup>②0</sup>在三国时代“山越”散居东南山地，常为孙吴肘腋之患，曹魏也利用此策动他们反吴。《三国志·吴书》曾有记述：“丹阳贼帅费栈受曹公印授，扇动山越为作内应”《陆逊传》；“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贺全等传》；“建安五年权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孙权传》。因此才有上述吴兵大动干戈入闽镇压。三国以后经六朝至唐五代仍有山越在闽浙一带山区反抗官府。《陈书·世祖本纪》记：“世祖以功援持节都督会稽等十郡诸军事会稽太守。山越深险皆不宾



附，世祖分命讨击悉平之。”闽西在汉武之前曾是越族南海王刘织的府治，同样隐匿着大量“山越”，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也由滨海文化族群变为游耕文化族群，与“蛮獠”为伍。

“蛮獠”在六朝至隋唐曾是闽西山区的主族，《福建通志》记：“六朝以来，戍闽者屯兵于龙溪，阻江为界，插柳为营，两岸尽属蛮獠”。一直到唐末还有黄连峒两万蛮獠聚哨作乱，反抗王潮围汀州，对于“蛮獠”的历史理解，《说文》把蛮、闽并列<sup>④</sup>，谓“蛮，南蛮，蛇种，从虫声。”《尔雅·释天》“宵田为獠”；《说文》释“獠”曰：“猎也”。从今天角度看，当时为皇朝正史蔑称的“蛮獠”只是一些不服官府管束的“自由民”，是过着山居、狩猎、游耕为生的“山民”，《广东通志》载：“峒獠（按：即蛮獠）者，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唐末以来开拓浸广，皆推其雄长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不可拘縻者则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年甲、姓名，以射生物。凡活虫豸，能蠕动者，皆取食之，谓之山獠”。这些“蛮獠”后来各处衍称为各支的少数民族，宋代刘克庄《漳州谕畬》一文中称“凡溪洞，称类不一：曰蛮、曰瑶、曰黎、曰蜒，在漳者曰畬。……二畬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畬民不悦（役），畬田不税，其来久矣！”《龙溪县志》也载：“穷山之内有蓝雷之族焉，不知其所始。姓蓝雷，无土著，随山迁徙，而种谷三年，土瘠辄弃去，去则种竹偿之，无征税，无服役”。这些“蛮獠”实际就是闽西早期居民，即所谓“土著”。《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战国策·魏策》记述吴起追溯三苗族的活动范围时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鄱阳湖）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即闽山指武夷山一带）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墨子·非攻下》称禹“亲把天子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有三苗焉”。三苗便节节南退，广泛分布南方和东南地区，其中也包括跨“文山”入闽，他们“无君